

周叔蓮選集

山西人民出版社

周叔莲选集

*

山西人民出版社出版 (太原井州北路十一号)

山西省新华书店发行 山西省七二五厂印刷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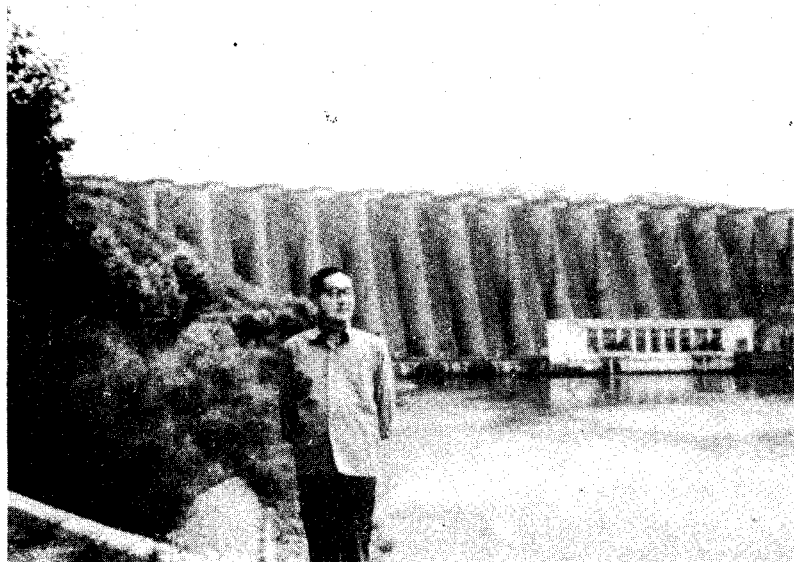
开本: 850×1168 1/32 印张: 19.875 字数: 458千字

1987年3月第1版 1987年3月太原第1次印刷

印数: 1—4,200册

*

书号: 4088·165 定价: (精装)6.40元
(平装)4.60元



作者1983年摄于安徽省梅山水库

重视企业行为规律的研究

周叔莲

正如人的行为有其规律一样，企业的行为也是有规律的。我国进行经济体制改革的一项重要任务，就是要通过改变企业的内外部条件，改变企业的行为规律，使企业的行为适应发展社会主义有计划的商品经济的要求。当前有识之士纷纷改进宏观经济管理，而003号则改进微观经济管理也要求认真研究企业的行为规律。

我国企业的行为正在发生

重大变化

企业的行为规律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例如对企业的行为企业的行为有两种相反的情况。

作者自传

1929年我出生于江苏溧阳县。在家乡读完初中后，1946年3月考入江苏省立常州中学读高中。常州中学是当时全国最好的几所中学之一。老师水平高，同学学习刻苦。以后我比较爱读书，相当程度上是常州中学校风的熏陶。

1948年9月我进入上海同济大学哲学系学习，学习时间不长，这年年底就休学了。但是这几个月培养了我对哲学的兴趣。后来我养成一个习惯，隔些时候要找些哲学书看看。除了学习马克思主义哲学，也学习其他哲学理论。我凭经验感到，阅读好的哲学书可以使人“聪明”一点。

1950年9月至1953年8月，我在上海复旦大学经济系学习，如愿以偿地得到了系统学习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机会。我如饥似渴地学习，除了认真听老师们讲课，还阅读大量的参考书籍。以前我只是自己买一些书或向同学朋友借一些书阅读，复旦大学图书馆藏书如此之多（在我当时看来），激起我莫大的喜悦和更强烈的求知欲望。我体会到了读书的乐趣。

大学毕业后我到中国科学院经济研究所工作。当时经济研究所刚建立不久，研究人员很少，研究任务经常变动。我先被分配搞中国近代经济史，不久又改行搞畜牧业调查，后来又搞手工业调查和水土保持考察。由于课题变动频繁，每个课题搞的时间过短，这些方面都没有做出多少成绩。但是，这些工作

扩大了我的知识面，使我接触了实际，懂得应该把理论和实际结合起来。在这之前，我是出了家门进校门，出了校门进书斋，很少接触实际，通过这个阶段和以后的实地调查考察，在一定程度上克服了理论脱离实际的缺陷。

1956年起我开始研究农业经济问题。到文化大革命以前，我撰写了一批有关农业的地位和作用、农业扩大再生产、人民公社、级差地租的论文。这个时间我还参加了孙冶方同志主持的社会主义经济论的研究工作，并写了若干篇有关社会再生产和其他问题的论文。限于篇幅，这些文章都没有收入这本选集。

文化大革命中断了我的研究工作。想起在那无休无止的斗争会、批判会、检讨会上浪费的宝贵光阴，现在也还是痛心的。不过这期间我也抓住了一些时间进行学习。在干校时间，劳动之余，我曾借了别的同志的《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一本一本地阅读。后来回到北京原单位，我又结合学习外文，到北京图书馆、中国科学院图书馆和经济研究所图书馆借阅西方经济学和西方经济史的著作。这些学习对我现在的工作都有帮助。

从1974年到1979年，我被借调到国家基本建设委员会的一个研究组工作。我曾和建委的同志以及其他单位的同志到一些工厂和建设基地进行调查，后来又在大庆油田作了较长时间的考察。通过这段工作，我对我国国民经济运行的情况和问题有了较多的了解，同时深切体会到林彪“四人帮”散布的谬论对实践造成的严重危害。我在粉碎“四人帮”以后一段时间内发表的文章，大部分是这些调查研究的结果。以后时期的研究成果，很多也得益于这一阶段的工作。

这一期间的工作使我的研究重点由农业经济转向工业经济

和基本建设。1979年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分出工业经济研究所等单位，我就随着到了工业经济研究所，一直到现在。

我在1983年以前写的一部分论文，已先后编成四本文集，即《社会主义经济建设和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和吴敬琏、汪海波合作，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2年出版）、《论经济管理》（山西人民出版社1983年出版）、《经济结构和经济效果》（广东人民出版社1983年出版）、《中国式社会主义经济探索》（辽宁人民出版社1985年出版）。收集在这本选集中的，约有一半是1984年以后写的论文。

我的工作使我不得不涉及很多研究领域，其中有些领域是我的理论素养和业务能力所难以胜任的。事实上，我对经济科学的探索至多只是提出了一些问题，这些问题是否提得正确，还有待实践来证明，至于解决这些问题，则更有待于经济学界同行们的共同努力。

确切的说，这本选集决非我一个人的成果。如果没有师长们、同事们、亲友们从多方面帮助我，我是不可能写出这些文章的。在此，我向一切关心过我、鼓励过我、帮助过我的人们致以深切的谢意。我也非常感谢山西人民出版社的同志为出版这本选集付出的辛勤劳动。至于选集中的缺点和错误，则应由我自己负责。我期待着读者的批评指教。

周叔莲

1986. 4. 6

目 录

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理论依据

谈谈中国经济管理体制改革的理论依据·····	(3)
再谈中国经济管理体制改革的理论依据·····	(10)
论经济管理体制的内涵、模式和演变·····	(20)
建设中国式社会主义的指针·····	(32)
改革经济体制和建设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	(43)
建立中国式的社会主义经济体制·····	(55)
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回顾与前瞻·····	(67)
从巴山轮会议看中国经济体制改革·····	(82)

社会主义商品经济

关于社会主义商品经济问题争论的思考·····	(107)
对社会主义商品经济要有全面的认识·····	(137)
关于我国国内市场问题·····	(156)
关于计划经济中市场的作用问题·····	(163)
农产商品化和国民经济现代化·····	(180)

企业行为和企业活力

重视企业行为规律的研究·····	(205)
再谈企业行为规律问题·····	(214)
价值规律和社会主义企业的自动调节·····	(231)
增强企业活力的几个问题·····	(269)
抓好大企业是一个战略问题·····	(281)
一定要把大中型企业搞活·····	(291)
简论企业素质·····	(310)
学习外国企业管理经验 提高我国企业管理 水平·····	(317)

宏观经济管理

基本建设规模和社会经济机制·····	(325)
集中财力物力和改革经济体制·····	(339)
企业活力和宏观管理·····	(355)
根据社会主义商品经济的要求改进计划工作·····	(388)
工业发展速度和经济体制改革·····	(418)

技术进步和新技术革命

论现有企业的技术改造·····	(431)
-----------------	---------

设备更新改造的几个问题·····	(437)
引进先进技术和加速实现四个现代化·····	(446)
试论新技术革命的社会经济影响·····	(456)
试论新兴产业和传统产业的关系·····	(477)
新兴技术和经济管理·····	(491)
评《大趋势》和《第三次浪潮》中的几个观点··	(502)

经济发展战略

对于制订有中国特色的经济发展战略的探讨·····	(517)
一定要重视经济效益·····	(528)
论经济增长和经济效益的关系·····	(534)
合理化的经济结构和经济结构的合理化·····	(552)
经济结构的内涵和研究经济结构的任务·····	(571)
回顾孙冶方“最小—最大”理论引起的争论·····	(586)
战略转变和经济发展·····	(606)

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 理论依据

谈谈中国经济管理体制 改革的理论依据

我国经济管理体制改革中，提出了很多理论问题。这不是偶然的。因为，改革经济管理体制需要理论作指导。例如，为什么要改革，如何改革，如何解决改革中出现的问题，如何进一步推进改革，建立符合中国国情的社会主义经济体制，都要要求理论给予指导。改革的实践也在检验着理论，使我们舍弃一些过时的理论观点，提出一些新的理论观点。这些新的理论观点同样要由实践来检验。最近学术界研讨的我国经济管理体制改革的理论依据问题，就是这样产生的。讨论这个问题是必要和有意义的。

我国经济管理体制形成发展的历史充分说明理论研究是十分重要的。我国长时期来实行的经济管理体制是以斯大林的社会主义经济理论为依据的。过去很长一段时期内，我们是全盘接受了斯大林的这些理论观点的。毛泽东同志对斯大林的一些观点提过不同意见，但斯大林关于商品生产、价值规律的理论也是基本上接受了的。斯大林领导下形成的经济管理体制模式曾被当成唯一正确的模式。有些社会主义国家不照抄斯大林的做法，还被批评为修正主义。这就是长时期实行这种体制的思想基础。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前，也进行过几次改革，但大都是在中央和地方行政管理权限的划分上兜圈子，没有取得

应有的进展和成效。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就在于理论上未能突破旧框框的束缚，因而没有找到改革的正确方向。近四年来，我们在商品生产、价值规律、按劳分配、计划与市场等问题上展开了比较深入的调查研究和广泛的理论讨论，既坚持马克思主义，又发展马克思主义，突破了一些旧的传统观念，有力地推动了经济体制改革的进程。实践证明，理论是行动的先导；正确的理论指导，是坚持正确改革方向的保证。

那么什么是改革的理论依据呢？我想先谈谈一些同志对这个问题的看法。

有的同志提出商品经济的理论是改革经济管理体制的依据，也就是主张改革经济管理体制主要要按照商品经济的规律办事。如上所述，这几年在商品生产问题的研究上是有突破的。斯大林不承认全民所有制内部存在商品生产，不承认价值规律对社会主义生产有调节作用。我们突破了这些认识，从而明确了社会主义经济体制不能过分集中，要给企业必要的自主权，要发展社会主义商品生产，发挥价值规律的作用，等等。但是我们不能仅仅把商品经济的理论作为体制改革的依据。因为，商品经济的理论不能回答体制改革中的很多问题。例如，不能回答社会主义基本经济规律的问题，不能回答国民经济有计划按比例发展规律的问题，也不能回答按劳分配的问题。而这些问题在改革中是要十分注意的，有的是首先要注意的。再如，把商品经济的理论作为改革的唯一依据，就有可能得出这样的结论：社会主义经济主要要由或只能由价值规律来调节。这就有可能把改革引到不正确的道路上去。马克思在《资本论》的一个附注中说过：“商品生产和商品流通是极不相同的生产方式都具有的现象，尽管它们在范围和作用方面各不相同。因此，只知道这些生产方式所共有的抽象的商品流通的范

畴，还是根本不能了解这些生产方式的不同特征，也不能对这些生产方式作出判断”。（《资本论》第1卷，第133页）可见，商品经济的理论（即使是马克思主义的）不能作为改革经济管理体制的唯一依据。

也有同志提出社会主义企业的理论是改革经济管理体制的依据。我们过去长时期忽视对企业问题的研究，这几年情况有很大改变，很多同志进行了研究，提出了种种社会主义企业的理论。大家知道，正确处理国家同企业的关系是需要社会主义企业理论指导的，过去把企业看成是一个个车间，从而导致忽视企业相对独立性的做法。因此，科学的社会主义企业理论无疑是改革的一个重要依据。但是，即使是正确的社会主义企业理论，也不能作为体制改革的唯一依据。因为，企业虽是国民经济的细胞，但很多细胞组成一个有机整体后，细胞运动就不能用来概括这个有机整体的运动，所以企业的运动也是不能用来概括国民经济的全部运动的。事实也很明显，有关企业的理论回答不了社会再生产问题，也回答不了中央与地方，条条与块块的问题，而经济管理体制改革则必须解决所有这些问题。因此，企业的理论在这里也是不够用的。还要指出，有些有关企业的理论不能认为是完全正确的。例如有的理论否认社会主义国营企业可以自负盈亏，理由是企业亏了，自己负不了责任，这样就是把亏损作为国营企业经营的必然因素。这样的企业理论值得商榷。又如有的理论把国营企业看成是和私人企业一样的完全独立的单位，认为国营企业和国家的关系完全是外部关系。在全民所有制经济中，国家和企业不也是同一所有制内部的关系吗？把这种关系完全看成外部关系是否妥当呢？在一定意义上，国营企业只能是相对独立的单位，不能是完全独立的单位。把国营企业看成是完全独立的单位，依据这样的理论

是难以正确处理好体制改革中的有关问题的。

还有的同志把按劳分配或物质利益原则作为改革经济管理体制的唯一依据，这种看法也值得分析。按劳分配原则无疑是改革的依据之一，改革中必须贯彻这个原则，但是这个原则不能回答或不能全部回答如何处理中央与地方、国家与企业、企业与企业等一系列问题，也不能回答社会主义生产目的、再生产比例等一系列重要问题。事实上，仅仅依据按劳分配也不能正确解决劳动者的报酬问题。比如积累和消费的关系就不属于按劳分配问题。现在农业中的级差地租问题，也不属于按劳分配问题。物质利益原则比按劳分配原则涉及更大的范围和更多的内容，为了使企业有内在动力，应该认真研究和贯彻这个原则。但是体制中有很多问题，也不是仅仅依靠物质利益原则就能解决的。如中央、地方、企业之间的利益问题，仅仅依靠这个原则也难以解决好。

还有的同志认为，社会化大生产问题的理论是经济管理体制改革依据。在进行改革时，是应遵循马克思关于社会化大生产的理论的。但是，大家知道，社会化大生产的性质并不一样，有各种各样的社会化大生产。资本主义社会化大生产同社会主义社会化大生产是有本质区别的。因此，仅仅依据社会化大生产的理论，即使是马克思主义的理论，也难以解决体制改革中的一切问题。

我认为，由于经济管理体制问题的性质，由于它涉及全部经济关系和整个国民经济管理，因此，应该把马克思主义关于科学社会主义的全部理论作为改革的依据，而不能单单把其中的某一二个理论观点视为改革的全部依据。当然，为了解决某一方面的问题，把这个方面的科学理论作为依据，是可以的。但与此同时，也要注意其他有关的理论。否则，就会导致片面

性，就会使改革发生偏差。现在改革中出现的某些问题，不能说和理论上的片面性完全没有关系。这里包含这样的情况，有些理论本身不一定错，但在应该顾及其他理论和其他情况时却没有顾及，因而导致实践中的片面性和失误。

我说要把马克思主义关于科学社会主义的全部理论作为改革的理论依据，首先指的是马克思主义关于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理论。为了学习和研究的方便，政治经济学理论当然要分成一些部分，但是一定要看到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是一个完整的整体，部分不能完全脱离整体。在这个整体中，各个部分的地位是不同的，但是，也不能绝对地说哪一部分重要，哪一部分不重要。诸如社会主义生产关系的本质、社会主义生产目的、社会主义计划经济等部分，无疑是十分重要的，而商品经济、按劳分配、物质利益等部分，也都很重要。我们不能强调某一方面而忽视其他方面，不能在改革体制时忽视和违背其中一些十分重要的原理。更要注意马克思主义也必须发展。

现在我们常讲社会主义经济规律，这是完全必要的。但确实要防止一种简单化倾向，即把各个规律孤立起来，甚至把某些规律作过分简单的理解。有人曾批评斯大林把社会主义计划性理解得过分简单。社会主义经济包括多方面的联系，例如生产和需要的联系，各个部门之间的联系，劳动消耗和价值生产的联系，劳动生产率和使用价值生产的联系等等。而斯大林只把有计划和按比例联系在一起，似乎其他各种联系就不要有计划发展，这就导致计划工作的简单化，导致计划工作中不重视提高经济效益和满足人民的需要。这种批评意见，不是没有道理的。我们在研究所有制时也有简单化的倾向，有的文章把所有制说成可以离开生产、交换、分配等独自存在。事实上，所有制是不能离开生产、交换、分配等独自存在的。马克思说